

# 李浴日的孙中山军事理论研究

李龙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日新、逸仙，化名中山樵，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他是中国近代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军事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在反对满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武装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军事理论。“他的战争理论，继承中国固有兵法的精神，吸收世界各国兵学的菁华，并加以自己的独创而成。又是适应中国现代国家社会的需要而建立的。他凭着他战争的道理，运用他革命的战法，既推翻了满清，又完成了每一次讨贼军事的胜利。”<sup>①</sup>李浴日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学家，孙中山军事理论——“孙文兵学”的首倡者和开拓者。他于1942年7月出版了《中山战争论》，同年12月增订再版，后改名《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在国内出版数次，1952年在台湾首次增订出版。加上他在其它军事著作里的有关论述，形成比较完整的“孙文兵学”理论。为了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军事文化，本文拟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李浴日的孙中山军事理论研究进行初步概括和总结。

## 一、孙中山的军事研究和实践

孙中山军事思想，是孙中山关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它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它以三民主义战争、武装斗争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三民主义战争观、战争问题和方法论、战争指导思想、建军指导思想等基本内容。孙中山军事思想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李浴日在《中山战争论》里，通过概括和总结孙中山学习和指挥军事过程，探讨其“战争理论的渊源”，揭示其军事思想的发展规律。从而确认孙中山是我国近代一位伟大的军事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 （一）孙中山的军事研究

1、对中华民族优秀军事文化的系统学习和研究。李浴日认为，孙中山是依靠自学及与有关军事学家交流中掌握军事理论的：“国父一生虽没有机会进过军事学校，却常和军事专家研究军事，并自修古今中外的兵书，尤以他卓越的天才，和在西医学校时代科学修养的精湛，更助他成为一个大军事家的所在。”<sup>②</sup>“其对于我国古代各兵家兵法，亦有精湛研究，就中以孙子兵

法为最。曾评该书说：‘二千多年前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sup>(3)</sup>根据李浴日的研究，可把它分为以下2个阶段。

第一阶段，启蒙时期。(1)在家乡。“根据我们的考证：国父研究军事应溯源于太平天国灭亡后十年，国父十一岁在村塾读书时，村中有一个太平天国的遗兵，常到塾里为学童讲述洪杨革命的故事，国父听得，深慕洪秀全之为人，推翻满清之志，不禁油然而生，遗兵对国父特加爱许……并以洪秀全第二勉国父，国父得此徽号，引为无上荣耀，亦辄以洪秀全第二自居。”<sup>(4)</sup>这说明洪秀全革命思想对童年的孙中山就起过潜移默化的作用。个别学者可能认为这段考证神化了领袖，其实不然。因为一个人小时的生活环境对他将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古人强调周边环境影响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洪秀全革命思想对孙中山的影响正是如此。(2)入香港西医书院研习医学时。“国父自决心致力革命之后，对于军事学术即特别留意，一八八七年（丁亥）入香港西医书院研习医学，常置巨幅中国地图于楼壁，对之而筹思攻守之方……又与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昕夕往还，亦常研究军事问题。”<sup>(5)</sup>说明此时的孙中山，革命思想开始萌芽。李浴日称“此为兵要地理研究的开始”。

第二阶段，军事斗争思想形成时期。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孙中山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已经行不通。于是，他借“游东北、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李浴日认为，“此为政治军事的实际考察。”<sup>(6)</sup>不久，他到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明确制定反清革命纲领。这标志着他的军事斗争思想的形成。

为了从事长期的反清革命斗争，他钻研军事学问，研究战略、战术、战史。“国父对普通军事书籍，如典范令及各种教程，莫不熟读。”在《军人精神教育》里也提及游勇战术的伏击技能“与操典中所谓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却相暗合。”<sup>(7)</sup>据冯自由给李浴日的信回忆：“总理生平最烂熟者为太平军战史，对于进兵攻城得地之战法及地理往往如数家珍。其材料除得自私人纪录及官书外，外人所著关于太平朝事迹，几应有尽有。尝言革命用兵与国家用兵之战略不同，太平战法大可采用，并批判其胜败之由。”<sup>(8)</sup>说明孙中山对战学基础知识以及战理、战法已经烂熟，尤精研太平战法。他全面学习、钻研军事的目的，是为他的暴力革命提供借鉴。

2、对西方优秀军事文化的系统学习和研究。1903年夏，孙中山东渡日本，结识了日本著名军事专家日野熊藏少佐，与他研究散兵战术，认为该战术最适用于揭竿起义的中国革命军。除了笔记其口述外，孙中山还购置英文的英波战史及图书百数十卷，“日夕观摩，孜孜不倦”，同时为实施同志以军事训练。又秘密组织“革命军事学校”于东京，延聘日野为校长、小室健次郎大尉为助教。学科除普通兵学及制造盆子炮炸药外，尤注重波亚人散兵战术的传授。“至于国父

当时为推翻满清，在粤桂边境及各地所组织的革命军或称“民军”类似今日的游击队，战斗所用的战术，即是散兵战术（亦称“波亚战术”）。往后国父于民元发表《钱币革命通电》曾暗示采用散兵战术以抵抗帝俄。迄民十于一于《〈军人精神教育〉的讲词》中又主张采用游勇战术（即散兵战术），以与北方军阀交战，可见国父对散兵战术的心得，及起义军事所受散兵战术的影响。”此外还结识了美国“天下最杰出军事家”堪马利将军、俄国嘉伦、李糜及英、德、法将校多人。

“总理所读各国兵书，以德著英译为多。据言，军事学以德著为第一。”<sup>(9)</sup>据李仙根口述，“总理对外人用兵者最崇拜拿破仑，书架上满置各国名人关于拿破仑之著作……总理对拿破仑每次战役，皆了如指掌，有条不紊，据言：诸役以攻奥一役为最神妙，于战史上最有价值。”<sup>(10)</sup>认为“拿破仑的作战，深得孙子的蕴奥。”他对于英美各国出版之海军名著，无所不读。据说：每年都订有英国海军年鉴，常置案上，以供参考，并屡对同志详论海军在国防上的重要性。从李浴日的总结可以看出，孙中山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部分来源、吸收于西方资产阶级军事学思想，特别是法、德军事学思想。

## （二）孙中山的军事斗争实践

李浴日在《国父指挥军事的经过》里，对孙中山坚持武装斗争 40 年做了初步的总结。现以辛亥革命为分界线，把它分前后两个不同时期。

1、辛亥革命前，主要组织由联合会党为主转为争取新军为重点的发动反对清政府的武装斗争。李浴日认为，1885 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孙中山即决意致力于推翻满清的革命运动。“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以医术为入世之媒。”1895 年 11 月广州之役，首开他指挥军事的记录：“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遂开干亨行于香港为干部，设农学会于羊城为机关。当时赞襄干部事务者，有邓荫南、杨衢云，黄咏商，陈少白等。而助运筹于羊城为机关者，则陆皓东、郑士良，并欧美技师及将校数人也。予则通常往来广州香港之间，惨淡经营，已过半载，筹备甚周，声势颇众。”<sup>(11)</sup>后因消息泄露而失败。但这却是孙中山武装革命的重要开端。这一时期所采取的军事策略、方针，体现了他在暴力革命初期的军事思想。此后，孙中山积极策划各地的军事暴动。由他直接发动起义的有：1900 年惠州之役、1907 年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钦廉之役、镇南关之役以及 1908 年钦上思之役、云南河口之役等。

镇南关之役是孙中山亲自发动对清政府的第 6 次打击，也是他指挥军事的典型战役。这次战役由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而失败，但与前 5 次战役结合起来，积小胜成大胜，李浴日认为，“政治上却取得巨大成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动摇了清政府统治，造成革命的声势，促

进全国各地的起义。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及次年3月29日的黄花岗之役，就是在它们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因而也促成了武昌起义。

从李浴日对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发动的各次武装起义的总结看，这些起义，均是分散的、小规模起义，起义人员是以会党为主力，联络新军响应。矛头直指满清政府，“民族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其暴力革命的策略是游勇战术、以少胜多战术等。

2、辛亥革命后，主要发动了反对封建遗孽及反革命势力的保卫民国的斗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就职后，他主张用武力彻底解决清帝遗留问题，并进行北伐，统一中国。在《复黎元洪指示北伐方略电》里他对北伐做了战略上的布局。此后，北伐军所向无前，连战皆捷，各路亦正谋分进合击，直捣幽燕。但清廷授意袁世凯假和谈，并用计攫取了辛亥革命革命的胜利果实。

从此，孙中山重整旗鼓，走上了保卫民国、改造民国的长达13年的武装斗争。“十余年间，由讨袁之役（民二及民四两次），而护法之役（民六声讨冯国璋，段祺瑞）、而讨莫荣新之役（民九）、讨陆荣廷之役（民十），而讨陈炯明之役（民十一至十三），而讨沈鸿英之役（民十二）及削平广州商团之变（民十三）等。”<sup>（12）</sup>通过这些武装斗争，孙中山在建立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进程中开展了艰苦的探索。他的军事思想也在这些曲折复杂的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李浴日以孙中山平定陈炯明广州叛乱和惠州东征为例，从孙中山的胆色、决断能力、指挥作战才干、战略布局等方面进行阐述，说明孙中山“比之中外古今的名将，毫无逊色。”第一，临危不惧的胆色：“于民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嗾使部下叶举围攻总统府，欲置国父于死地……（国父）在叛军的刀光剑影中，从容退入楚豫舰，转登永丰舰。”进攻车歪炮台时，“各舰舰长目击叛军炮火占优势，畏缩不敢前进，国父以身作则，令座舰驶于先头，一致攻击前进。”当坐舰寄碇白鹅潭时，陈炯明运动海军哗变，施放水雷鱼雷，威胁国父，遣派飞机，盘旋于坐舰之上，又用民船钢板小轮及敢死队，图袭国父座舰，“这时全体官兵均惊惶失色，国父却屹然不动。”第二，英勇、机智决断的能力：“二十日，至飞鹅岭筹攻惠州，上午十一时至炮兵阵地，被逆军发见，敌即不断发炮向国父射击，弹落身旁，距不寻丈，从者多为国父危，而国父但谕以无恐，并谓敌炮射程已止于此，纵密发，必不及。此种大无畏精神，与料敌之准确，军事专家叹为罕见。”<sup>（13）</sup>当肇和、海琛、海圻三大舰为陈炯明运动，驶离黄埔时，叛军以为国父所停止在黄埔各小舰，由于海心冈水深只有六尺，不能通过。“他为应付这个突变，即派员往测该处河水的深度，一听得水深达十五尺的报告，私心大喜，立即督率各舰从黄埔上游，经海心冈驶出……这一个断然的处置，使全体海军将士，为之心折，就是叛军方面，也深惊其神算。”第

三，统揽全局的战略布局：“竞存不日动，各宜先后继起。舰队若遇被令分防，宜立即集中江门，与附近各营同时起事。并令少部队与数小舰进攻三水，握而守之，以断其交通之路。以大队水陆并进，取香山、顺德握而守之，以容奇为舰队根据，以大良为部队大营，以甘竹、勒楼、黄连、紫坭菜、蕉门中一带之水为防线，水陆军握而守之，为持久计。此防布置妥当，即分兵进取虎门东莞石龙一带为右翼，以绝彼东江之交通。然后分东西路水陆夹攻：西路取道官窑石门，水路以攻石井，东路取道广九铁路，进攻长州牛山各炮台。得手进攻河南花地，与西路联络，而包围佛山陈村敌军，尽缴其械。如此省城可不攻而下矣，此作战方略之大要也。务望与舰队同志谨识而执行之！”<sup>(14)</sup>

李浴日通过以上战例概括孙中山的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以无可辩驳的史实确认孙中山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的历史地位。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sup>(15)</sup>

## 二、关于三民主义战争观

三民主义战争观是孙中山关于战争问题的总的看法。包括他对战争的起源、本质、目的、历史作用、战争诸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待战争的态度、消灭战争的途径等问题的基本观点。是衡量孙中山三民主义战争正义性质的重要标志。李浴日在《中山战争论》里对这一重要问题给以初步概括和总结。

### （一）战争的定义

李浴日认为，孙中山对“战争”做了如下的定义：“国父对于战争这个术语虽然没有下过一个完整的定义，但在《民权主义》里却说过：‘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相争。’”<sup>(16)</sup>“国父亦认（为）战争属于政治的形态，他说：‘政治的海、陆军力’，跟着又说：‘应用政治力去亡人的国家有两种手段：一是兵力，一是外交。’”<sup>(17)</sup>这个界定基本上揭示出战争的内涵，表明战争是指“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是政治通过暴力的继续。然而，孙中山并未看到阶级斗争是战争发生的另一种形式：“国父认为阶级战争，是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在今日的中国则不能发动此种战争。他说：‘阶级战争，即工人与资本家之战争也。此种之战争，现已发动于各工业国家者，极形剧

烈……中国因工业进步之迟缓，故就形式上观之，尚未流入阶级战争中。吾国之所谓工人者，通称为苦力，而其生活只以手为饭碗，不论何资本家，若能成一小工店予他等以工作者，将必欢迎之。况资本家在中国寥若晨星，亦仅见于通商口岸耳。’ ”<sup>(18)</sup> 它反映了孙中山对战争认识的历史局限性。

## （二）战争的起源

李浴日认为，国父对于战争发生的见解，不是看做偶然的现象，也不是看做经常的现象。他认为有国家即有战争，战争是国家间不可避免的现象：“论国家之起源，大概以侵略人之目的，或以避免人侵略之目的而为结合，其侵略人固为战争，即欲避人侵略亦不能避去战争。”<sup>(19)</sup> 即是说战争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又认为帝国主义“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别国的主义……欧洲各民族都染上了这种主义、所以常常发生战争。”<sup>(20)</sup> 表明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还认为“在革命过程中，战争亦为不可避免的现象，诚以革命是最艰巨的事业，或为从事于统治者的推翻，或为从事于侵略者的打倒，唯有诉诸流血的战争，决不是采取温和的手段所可奏效。故国父当革命之始，即揭橥‘趋除鞑虏’的纲领。又确定‘军政时期’为革命建设步骤的第一个时期。换言之，就是战争时期。”<sup>(21)</sup> 即是说三民主义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道路，用战争来解决问題。

李浴日关于孙中山的战争发生的三方面的论述，表明孙中山已经能正确看待战争的起源问題。但在《民权主义第一讲》里他把战争划分为4个时期，其中“人同兽争”、“人同天争”（见李浴日《纵横战史》）当做战争发生的前2个时期，对战争的起源做了比较含糊的解释。而他关于三民主义革命战争的论述，却反映了孙中山暴力革命思想的形成和飞跃。

## （三）战争的目的

李浴日认为，三民主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战争，消灭战争，求得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和平。他从民族主义出发，把民族战争区分为“侵略战争”和“革命战争”：“就是国父不是克氏为战争而战争的论者，乃是为革命而战争的论者，他一面反对‘野蛮’与‘弱肉强食’的侵略战争，另一面却主张‘以战止战’，‘为人类作干城，为进化除障碍’的革命战争。亦即为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战争，可见他的战争思想比克氏来得正确和进步。”<sup>(22)</sup>，表明三民主义战争是民族自卫战争，是挽救民族危亡和抗击外侵必须采取的手段，是正义的战争。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野蛮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它反映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战争观在新的国内、国际条件下的丰

富和发展。“至于根据国父最高的理想，战争并不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却有待于大同世界的实现……这便是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亦即三民主义最高理想的实现。”<sup>(23)</sup>这就是说，战争将随着“大同世界”的实现而消亡。从李浴日的概括可以看出，“以战止战”的战争目的，反映了孙中山一生求和平、求解放、谋统一的战争思想。这是同时代最为革命的进步思想。

#### （四）三民主义战争的本质

李浴日认为，“大凡战争思想是政治思想的反映，国父的三民主义是我们的政治思想。自然我们的战争思想也是三民主义的战争思想，即为实行三民主义，造成民有、民治、民享的为国家而战的战争思想。”又说：“三民主义的战争思想的本质，是为求生存，求和平的，又是反极权的，反侵略的，这是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思想相协调，相一致，抑且更为进步和完美。”<sup>(24)</sup>。根据李浴日的阐述，包含着如下三大内容：

1、为民族生存而战。李浴日认为，“这可以说是国父战争思想的核心。”它有三层意思。第一，民族压迫必须通过民族战争来解决。李浴日认为，孙中山已经意识到改良主义不能解决民族矛盾，必须采用战争手段：“满清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同盟会宣言》）“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冀脱吾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轡。”“所以国父当进行推翻专制君主的满清之时，便倡率起义，采取战争手段。”表明推翻满清封建专制必须依靠暴力革命，才能换取民族解放、国内和平。第二，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李浴日认为，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战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孙中山逐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它们以侵略和掠夺财富为目的：“国际战争者无他，纯然一简直有组织之大强盗行为耳。故对此种强盗行为，凡有心人，莫不深疾痛恨之。”（《实业计划结论》）“欧洲数年大战的结果，还是不能消灭帝国主义，因为当时的战争，是一国的帝国主义和别国的帝国主义相冲突的战争，不是野蛮和文明的战争，不是强权和公理的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仍是一个帝国主义打倒别个帝国主义，留下来的还是帝国主义。”<sup>(25)</sup>这是孙中山暴力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化。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如“抵抗外国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积极的，这种方法，就是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权、民生之解决以与外国奋斗。二是消极的，这种方法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极的抵抗，使外国的帝国主义减少作用，以维持民族的地位，免致灭亡。”<sup>(26)</sup>这对提振中华民族意识、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起到了号召的作用。第三，必须扶助世界弱小民族、国家的生存。他在神户演讲《大亚洲主

义》时说：“要请欧洲人之在亚洲者，俱以和平方法，退还亚洲人之权利，如果不能达到目的，便当诉诸武力。”表明孙中山始终把争取民族独立和捍卫世界和平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李浴日概括说：“依此可见，国父的战争思想是以民族、国家的生存为核心昭然若揭。他发动推翻满清，是为求中华民族的生存，他主张抵抗帝俄，也是为求中华民族的生存，他屡次兴师讨贼，也是为求中华民族的生存。”表明孙中山战争思想的民主革命性和时代进步性。

2、为民权而战。内容包括：第一，建立和实现共和国的民主政治，要经过“军法”、“约法”、“宪法”三个时期，只有依靠革命暴力，才能确保这三个时期方案的实现。孙中山认为，“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军阀惟知以武力据地盘，以欺诈保权利。”所以，民国建立后，他先后实行讨袁、护法、讨莫、讨陆、讨陈、讨沈及北伐曹吴的斗争。“军事的奋斗，推翻不良的政府，赶走一般军阀官僚。”表明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只有依靠武力才能捍卫民主共和。第二，为民权而战就是为正义而战：“四年以来，爱国之士，讨伐军阀及卖国贼，无非为护法主义及国家生存计，此不能名为南北之争，实共和主义与军阀主义宣战，爱国者与祸国者宣战而已。”<sup>(27)</sup>他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事实上，不能禁军阀中之一派不对于他派而施以攻击，且凡属军阀莫不拥有雇佣军队，推其结果，不能不出于战争，出于抢夺，盖抢夺于邻省，较之抢夺于本省为尤易也。”这就是说，三民主义革命是正义斗争，只有赶走封建军阀，人民才真正掌握政权。

3、为民生而战。有三层意思。第一，为生存而战。李浴日认为，“这可以说是国父战争思想的核心。”因为“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sup>(28)</sup>又认为，“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国父说得更明白：‘人类如能够生存，就须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养，保和养两件大事，是人类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卫。’”表明当人类的生存遭到威胁，就要通过战争途径进行防御和自卫。第二，要把战争与解决民生问题结合起来。李浴日认为：“国父早见及此，于《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地尽其利’的‘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为‘富强大经，治国大本’。于《民主主义》里又强调：‘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吃饭问题。’又说：‘吃饭问题就是顶重要的民生问题，如果吃饭问题不能解决，民生主义便没法解决。’表明战争影响民生，民生也可以影响战争。第三，解决民生的经济问题不需要用战争手段。也就是说获得政权之后平均地权，使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不需要

通过战争途径去解决。但要把进行民族、民权革命战争作为解决民生的前提条件。李浴日对这一问题阐释较为简略。

基于以上的论述，李浴日认为“国父的战争思想是革命的，是救国救世的战争思想。换言之，是以‘仁’为中心并以‘世界大同’为最高理想的三民主义的战争思想。”这“便是国父战争思想的本质，亦即国父的战争观。”从中可知，李浴日概括的孙中山三民主义战争观相当充分和完整，说明三民主义战争观是以民主革命为基础的，是以民族革命为前提的。目的是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自由、富强。

#### （五）关于战争与政治、经济、宣传诸因素的关系

1、战争与政治。李浴日认为，孙中山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是：战争是政治的手段，政治能反映出战争的本质。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父是受着克氏学说的影响的，但克氏是为战争而战争，却不问政治目的的好坏，国父却是为革命而战争，有着伟大的政治理想，这是国父比克氏进步得多了。”<sup>(29)</sup>李浴日还认为，孙中山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反映在他对政治跟战争的作用的理解上，尤其是作为政治的两大形态——内政和外交对战争的影响方面。“我且把国父关于战争与政治的言论亦即战时政治的言论，分为内政与外交两方面来研究。”（1）内政关系战争胜败的所在。因此，战争要求于内政：首先要举国团结一致。“中国现在时势，在危险时代，如各自为谋，不以国家为前提，无论外人虎视眈眈，瓜分之祸，危在眉睫。即使人不我谋，而离心离德，亦难有成。是中国欲建巩固之国家，非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不足以杜外人之觊觎。”<sup>(30)</sup>其次，内政要服务战争，做到“足食”、“足兵”，建立“万能政府”、实行集权等。离开了这两点，非导致战争失败不可。（2）外交。李浴日说，孙中山认为外交的作用也相当大。战前，外交可代替军事；战争一经爆发，外交就要协助军事；战后，外交又是促进和平的手段。“用政治力亡人国家，本有两种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sup>(31)</sup>“凡国家之国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达其目的。外交手段既尽，始可及于战争，战争既毕，仍当复于外交之序。故国与国遇，用外交手段与用战争手段，均为行其政策所不可阙者。”因此，他提出了搞好外交的有关主张。如“联络素日亲厚与国，亦即‘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和维持列国对我素持之主义”的两个基本方针，还提出了要明了情况、争取自主、把握利害几项外交政策。如“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大凡立国必须与利害相关之国，携手进行，方能进步，利害不相关之国，纵彼欲与我相亲，但是不可以与之亲近者……今日谋巩固中华民国，必须注重外交。”等等<sup>(32)</sup>这些主张，建立在相互平等、和平共处、自主、互利的基础

上，它与清政府的屈辱外交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外交有本质的区别。为现当代制定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李浴日关于孙中山的战争和政治及其各要素的关系的论述，说明军事从属于政治，政治是战争胜利的首要因素，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

2、战争与经济。李浴日认为，孙中山深刻体会到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战争离不开经济。“近代战争是金钱的大需要者，也是金钱的大量消耗者。”即战争不仅是军事、政治的较量，同时也是经济的较量。而一国经济主要体现在财政、工业、粮食、交通等方面。(1) 财政。战争需要财政的支持和保障，财政制约着战争发生和进行：“倘财政之困难能解决，则军事敢说必有把握。”孙中山在一系列的军事斗争实践中，采取了诸如发行、增税、借债及募捐等办法和措施，解决战时财政问题，形成了他的财政思想。(2) 工业。它在现代战争上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财政。战争可以促进工业的发展，工业发展的快慢对战争产生影响。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实业计划》里就如何发展工业提出了许多主张。这些主张包括引进外国技术和人才，发展煤、铁、石油等矿业，处理好平时工业与战时工业的关系等方面。如“吾国既具有天然之富源，无量之人工，极大之市场，倘能借此机会，而利用欧美战后之机器与人才，则数年之后，吾国实业之发达，亦能并驾欧美矣。”<sup>(33)</sup>这些主张反映了孙中山富民强国的民生思想。(3) 粮食。粮食是战争的生命，决定战争的胜败。孙中山在《大同主义》里十分明了地阐述了粮食与战争的关系，他以第一次欧战的德国为例，说明吃饭问题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德国的粮食，在平时已经是不够，欧战时，许多农民都去当兵士，生产减少，粮食更缺，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便以失败结束。可见全国的吃饭问题是很重要的<sup>(34)</sup>他强调，实现中国粮食自给，首先从增加生产着手。如采取7个增加生产的方法（机器、肥料、换种、除害、制造、运送、防灾）。其次做好粮食消费的管理，如设置“粮食管理局”、稳定粮价等。再次，要在法律上做出种种规定来保护农民。如给他们鼓励和保障，平均地权，使耕者有其田等。(4)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军事行动的生命线。现代交通，分为陆、海（水）、空三大系统。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目睹中国交通的落后，又认为交通上最紧要的是铁路。”十分重视交通建设，曾专任铁路总办职务。如何发展交通，孙中山在《实业计划》等著作里，提出了具体的内容。

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是孙中山民生思想的重要内容。李浴日对孙中山关于这一问题的阐释，说明孙中山已经看到了战争对经济的巨大依赖作用，同时看到了战争对经济的间接促进作用。解决经济问题，就解决了战争中的重大问题，也就解决了民生中的社会重大问题。

3、战争与宣传。孙中山深深体会到宣传在暴力革命中重要性。在《言语文字的奋斗讲词》里指出：“向民众宣传，就是同向敌人的猛然进攻一样。”说明它的效力相当大。又说：“革命成功极好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用一成。”同时，认识到宣传在战争中对敌我双方发挥的巨大作用。如对敌宣传能够瓦解敌人，使敌方哗变，“变反动的兵力为革命的兵力”；对己宣传能够激发爱党、爱国热情，在对敌斗争中团结一致等。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那些清兵有自动力的根本原因，全是由于我们宣传的效果。”因此，他提出了做好宣传战的种种方法和主张。如做好宣传作战计划、注意宣传方法、培养宣传人才等。在《军队战胜与党员奋斗》中强调：“诸君去年到今，笔墨上用力不少，然或不免于浪费，盖作战须有计划，攻击必有目标。”“我党均须每日学习宣传方法，时时训练，训练纯熟，然后才能战胜一切。”这是说宣传战要先于武力战而开始，武力战一开始更要作适切的配合。

李浴日对孙中山关于影响战争各因素及采取有关措施的分析 and 论述，说明战争不是孤立的产物，它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孙中山重视战争关系，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入手，阐述他对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战争与宣传问题的看法，形成了新的战争观，具有时代精神。

### 三、国防建设思想

“国防建设即是战争准备”，包括精神国防和物质国防两部分，“或分为政治国防、经济国防、文化国防及军事国防。”李浴日认为，国防建设是孙中山军事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之一。根据李浴日的考证，“国父的国防言论，可以远溯《上李鸿章书》的‘人尽其材，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也可以说是他最初关于国防的主张。”此后于1912年在《广州军界欢迎会致词》、1913年《复陈其美先生论建设国防武备书》、1924年演讲三民主义中等处对国防建设提出阐述。所以，国父因饱受第一次欧战的教训，又目击国防废弛所导致的危机，更感到过去“海防论”、“洋务论”、“时务论”及“维新论”的错误与失败，认识到“没有国防，便没有国家。”多次强调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决意为国防建设开辟一条新生之路。1921年7月8日给廖仲恺的信里，又列出《十年国防计划》纲目，计有62条，内容相当丰富。李浴日据此归纳为如下四方面：

#### （一）国防政治建设

主要包括：国防与国（主）权，国防与宪法，国防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中央与地方政府之关系，国防警察之训练，都市与乡村之国防计划，国防与人口问题，移民东三省、新疆、西藏、内外蒙古各边省计划，保护海外各地华侨、外交之政策和战时外交之政策等（参见《十年国防计划》纲目）。

## （二）国防经济建设

国防经济表现为三种形态：第一、平时经济，作战争的准备，其主要目的，仍在满足一般国民经济的需要；第二、过渡时期经济，即在战争危机迫切的时候，实行各种准备战时经济的手段，如经济动员；第三、战时经济。即经济战争，主要在满足国防武力，国民经济的需要，及对敌实施经济战。国防经济建设计划，具体包括国防与实业计划之关系、发展国防工业计划、发展国防农业计划、发展国防矿业计划、发展国防商业计划、发展国防交通计划、发展国防交通计划、财政之整理等（同上）。

## （三）国防文化建设

充实文化的力量，首在实现学校教育的国防化，但亦包括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国防化。旨在把每一个国民养成“国防人”，以参加国防工作及全民战争。其主要内容有：训练国防基本人才三千万计划，训练国防物质工程技术人才一千万计划、指导国民研究军事学问之研究、奖励国民关于国防物质科学发明之方略等等。

## （四）国防军事建设

军事建设是国防建设的重中之重。“军事在国防上为重要的一环。上述政治、经济、文化诸部门均要与军事配合而并进。”军事建设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军事教育，即包括军事教育之改革与训练计划，军人精神教育与物质教育之比较，训练不败之海陆空军计划，遣派青年军校学生留学欧美各国、学习于各军事专门学校及国防科学、物质工程专门学校之意见书，聘请列强军事专门人员来华教练我海、陆、空军事学生及教练国防物质技术工程之意见书），二是军制之改革，即实施全国精兵政策，组织海、陆、空军队之标准、军医之整理及改良军人卫生之建设计划、军用禽兽之训练、军器之改良计划向列强定制各项海陆空新式兵器，如潜水艇、航空机、坦克炮车、军用飞艇、汽球等，为充实我国之精锐兵器，与仿制兵器之需。扩张汉阳兵工厂，如德国克虏伯炮厂之计划。我国之海军建舰计划、航空建机计划、陆军之各种新式枪炮战车及科学兵器机械兵器建造计划。购买各国军事书籍、军用品、军用科学仪器、军用交通器具、军用大小仪

器等，以为整理之需。新兵器之标准、各地军港、要塞、炮台、航空港之新建设计划、发展海军建设计划、发展陆军建设计划。三是作战计划，即举行全国总动员之大演习计划与全国海陆空军队国防攻守战术之大操演等。

李浴日认为，孙中山的《十年国防计划》纲目体现了他的国防建设思想。表明他始终把国家安全放在首位，把维护国家利益、抵抗侵略作为国防政策的立足点，这对树立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具有重大的意义。时至今日，它对我们建设强大、新型的国防，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四、建军思想

##### （一）建军要图

李浴日认为，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就建军问题有经验也有教训。所以，自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常以建军为倡导。在《〈共和须以兵力为保障〉讲词》说：“中国向以积弱称，由于兵力不强……现在共和粗建，须以兵力为保障。”“我中国未革命以前，列强环伺，欺凌侵并，无非以我国武力不足。今日民国正革命草创，欲中国成为巩固之民国，非有精强陆军不可。故民国前途依赖我军人之力正多。今日要务在乎扩张军备，以完成巩固之国，然后可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sup>(35)</sup>表明孙中山认识到建军是每一民族、国家的大事，从而使他从改造会党向建立革命军队的转变。李浴日认为，孙中山建军的意见和主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整理军政。整理军政是孙中山建设强大国防的重大举措之一。他在《国民党政见宣言》中说：“今日处于武装和平世界，对外方面，军备亟须扩张，然扩张军备，当自整理军备始。盖扩张军备之举，须待诸三四年后，而今日入手方法，则在整理军政，军政整理有序，而后始有扩张可言也。”<sup>(36)</sup>整理军政的方法有五种：（1）划分军区。除行政区域外，全国再划分数个大军区，军区独立处理军事，不仅可以集中精力于军备建设，也可实现军政分开，避免权力过分集中。（2）统一军制。今各省军队编制不一，纷歧错乱，非军事所宜。应使全国军队，按一定编制，俾军事归于统一。（3）裁汰冗兵。将操练不勤、老弱无用者尽行裁撤，留得强壮者训练纯熟，使之成军；实行“工兵”政策，对军队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农业及职业教育，使士兵退出现役时有就业机会，不致成为散兵游勇；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把国民当兵“定为义务，两年一易”，使每一国民不仅能享受国家权利，也能为国家尽义务。（4）兴军事教育。在全国学校，特别是大、中学中普及军事知识教育，以养成一般将校人才，利于战时扩充兵员。而创办黄埔军校是一个重大的举措。1924年1月，黄埔军校正式开学。黄埔军校的创办，为革命军培养了大量军事骨干力量。（5）扩充兵工厂：首先要增加武器生产，供给军队以充足的武器，同时向列强定购

各种海、陆、空新式兵器，如潜水艇、飞机、坦克等，“以为充实我国之精锐兵器与仿制兵器之需”。整理军政，实际包括对旧军队改造等内容。

2、加强练兵。李浴日认为，孙中山十分重视练兵工作，认为“练兵一事，为今日根本之图。”练兵的目的，是把他们练成既有独立作战能力，又要具有不怕死的精神。加强练兵，必须选好教练。精兵全靠教练，教练得不好，系乎战争的胜败至巨。练兵的内容，一是精神的训练。主要在养成其忠、勇合群的性格，以一当十的斗志，不成功即成仁的精神，按照《军人精神教育》所讲的内容，自然非短期所能完成，须假以相当长久期间。二是改革编制。孙中山在《致蒋中正函》中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可见，练兵是建军不可缺少的一环。

3、改善官兵生活。孙中山主张合理解决官兵的生活，以此鼓舞士气，安定军心：“兵士于革命胜利之后，国家应给以适当之土地，使复归于善良之农民。”“将现时募兵制度渐改为征兵制度，同时注意改善下级军官及兵士之经济状况，并增进其法律地位，施行军队中之农业教育，及职业教育，严定军官之资格，改革任免军官之方法。”<sup>(37)</sup>李浴日认为，“这个生活问题，是包括服役与除役、退役的生活问题。政纲中所说的‘注意……经济状况’，系指服役时的生活问题，如薪饷如何提高，衣食如何改善等。提案中所说的‘给以适当之土地’是指除役退役后的生活问题。至于‘施行军队中之农业教育，及职业教育’，这是为增进其改善生活的技能的。”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于官兵的生活问题非常重视。他把改善官兵生活作为建军的一项内容。

4、实行兵工政策。兵工政策就是“化兵为工”政策，即先行裁兵、安插被裁之兵。1923年初，孙中山陆续发表《和平统一宣言》、《裁兵筑路》、《欲救广东宜从裁兵禁赌及政良吏治着手》、《和平统一化兵为工》等讲词，以及《裁兵为统一和平之根本条件》谈话，对兵工政策作积极而广泛的号召。此外，关于空军、海军及装甲部队，他也有不少主张。表明孙中山的兵工政策是精兵政策，目的是强化革命军的战斗力。

#### 5、加强军人精神教育

李浴日认为：孙中山十分重视军人精神教育，认为军人精神教育关系到建军的成败，加强军人精神教育是建设强有力革命军的重要保证。他在《精神教育之要旨》一节里说：“欲身任非常之事业，则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之教育为何？即军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是也。……然革命精神，何自来耶？是在精神教育。”<sup>(38)</sup>通过教育，使每一个军人深明革命大义和军人自己的神圣责任，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乐于为国牺牲。军人精神教育有智、仁、勇、决心等内容，同时也包含物质的内含。不过核心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在《十年国防计划》纲目中，他曾列有“军人精神教育与物质教育之比较”一条，主张二者必须同时注意，强调现代化的军队必须有现代化的

科学技术来充实。孙中山先生深感我国物质科学技术落后，因而常遭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他曾大声疾呼地号召革命军人和全国人民在这方面的西方国家急起直追。

6、建立、健全军纪。孙中山认为，军纪是发挥军队战斗力重要因素。他认识到旧时的军队像一盘散沙所带来的危害，因而他特别强调：“倘军人与官吏借口于共和与自由，破坏纪律，则国家机关，万不能统一。机关不能统一，则执事者无专责，势如一盘散沙，又何能为国民办事！是故所贵乎机关者，全在服从纪律”<sup>(39)</sup>。在同盟会时代和倒袁时代，孙中山先生都制定有极严的军纪。如同盟会时代，他颁布的军律就有 22 条。如“降敌被获者杀”、“私通军情于敌者杀”、“强奸妇女者杀”、“焚杀良民者杀”、“私入良民家宅者罚”等，还有对盗窃者、赌博者、吃鸦片者进行严罚等等，这些都是相当严峻的。通过建立、健全军纪，以确保自觉遵守纪律的重要性。

孙中山的建军思想和方略并不是一次形成的，它是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它对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等都有较强的指导性，它奠定了中国近现代军事建军的基础。

## 五、战略、战术思想

李浴日说，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正如母子一样，战术依存于战略，又随战略所指示的方针而行动，战术的行动可以影响战略的成败，而正确的战略却常能给予战术致胜的基础。他认为，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非常重视对战略、战术的研究，他不仅运用了许多战略、战术，而且创造了不少战略、战术。李浴日归纳为：“在对内的革命战争中所采取的战略是攻势，即‘战略攻势’，在对外的革命战争上所主张的是守势，即‘战略守势’，至于战术则以采取攻击为主。”<sup>(40)</sup>

### （一）战略方面

1、战略攻势。有如下几种：(1) 奇袭式进攻战略：这种战略出其不意，灵活变动，神出鬼没。李浴日认为，“国父在对内的革命战争中，所采取的战法，像民元以前的进攻满清，是一种奇袭式的攻击，亦可称为游击战。”它是孙中山暴力革命早期较常采用的战略。如钦廉之役，“能一战而去清兵四分之一，可称奇捷。”又如镇南关之役，“孙中山先生于一九零七年命黄明堂适时攻占镇南关，又适时退出，这是一个典型的游击战。”(2) 义旗起呼，义动天地战略。也叫一地起义，数地响应战略。1915 年发表《讨袁宣言》说：“一旦义旗起呼，义动天地，当以秦陇一军，出关北指，川楚一军，规划中原。闽粤旌旗横海，合齐鲁以捣京左。三军既兴，我将与诸君子，扼扬子江口，定苏浙以树东南之威。犁庭扫穴，共戮国贼，期可指日待焉。”(3) 以少胜多进

攻战略：它是指数目较少的一方，进攻并击败数目多的敌人。其优势“或指挥人力、物力较少者之智力，或为将士用命。李浴日认为，“民元的兴师北伐，是采取战略攻势，民十一、十三的两次北伐以及历次的讨贼军事，也是采取战略攻势即以精神力比敌处于优势的革命军（然人数武器比敌处于劣势），作连续的进攻，求敌而歼灭之。”<sup>(41)</sup> 1915年讨袁、1917年护法也是采取这个战略：“凡我各省军民代表同心戮力……运筹宜决而密，用兵贵神而速，自能垂手燕云，复仇报国，直抵黄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sup>(42)</sup> (4) “分进合击”、速战速决进攻战略：就是命令军队从不同方位快速前进，协同围击同一目标。1924年东征陈炯明就是采取这种战略：“望兄鼓励各人速出，一由东江击破陈逆而出福建，一出江西，则川湘各军必争先而出武汉，而中原可为我有。否则不论奉直谁胜，西南必亡。际此之时，能进则存，不进则亡，必然之理也。”<sup>(43)</sup> 1924年北伐也是采取这种战略。他在《致蒋中正的信》说：“江西得救，则湖南不成问题，然后再会滇唐、川熊、黔袁，会师武汉，以窥中原，曹吴不足平也。”李浴日说：“于此可见，国父是采取拿破仑‘分进合击’的战略原则。”(5) 先发制人战略。即要进攻，其行动必先发制人，争取战争最初胜利，然后发展为整个胜利。李浴日认为这是我国古代兵法常用战略：“中山先生……所定计划，厥有两端：……一曰联日……二曰速战：中山先生以为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调兵遣将，行动极称自由，我惟有出其不易，攻其无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且谓宋案证据已确鉴，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sup>(44)</sup> 可见，孙中山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战略是不同的。

2、战略守势。即战略防御。李浴日认为，“关于对外抗战的战略，国父基于当时的情势是主张取守势的，亦即持久战略，消耗战略。因为敌人来侵，施行攻势作战，利在包围歼灭，速战速决，而我因军力比敌劣势，自然要施行守势作战以制之。但国父所谓‘守’，决不是绝对的‘守’，永远的‘守’，是以反攻为最后目标的‘守’。”

守势战略亦有如下几种：(1) 先守后攻战略。民初沙俄侵略我外蒙古，孙中山主张应先采取守势战略，即所谓谋不败之战略，以抗强邻而保领土，第5年练兵800万——1000万，然后转为攻势，直抵莫斯科、圣彼得堡。在《钱币革命通电》中它提出这个主张。(2) 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战略。即集中优势兵力迎击来犯敌人的进攻，最后消灭敌人。“此后战略宜大变更，集中全力速趋省城为上策，集中全力以扑灭麻子为中策，缩短战线，以保势力，而待援军亦为一策。惟不忍舍去土地，与敌相持，分薄兵力则为下策。望兄速酌施行！”<sup>(45)</sup> “竞存不日动，各宜先后继起。舰队若遇被令分防，宜立即集中江门，与附近各营同时起事……此防布置妥当，即分兵进取虎门

东莞石龙一带为右翼，以绝彼东江之交通。然后分东西路水陆夹攻。”（见《再致李绮庵指示作战方略电》）可见，孙中山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守势战略也是不同的。

李浴日认为，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对攻势与守势战略，并不把两者对立起来。虽说“较强的一方恒采取攻势，较弱的一方恒采取守势”，但在某种情形之下，攻势可转为守势，守势也可转为攻势。所以攻势固可以取得胜利，守势也可以取得胜利。说明孙中山对攻、守战略已经有了辩证的认识。

## （二）战术方面

战术，是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它是战争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李浴日认为，孙中山对战术的起源和演变有了正确的认识。“第一，关于战术的发生。国父认为它是发生于战斗的事实。”即是说，战术是战争的产物。“第二，关于战术的革命。拿破仑说过：‘没有十年不变的战术’。克劳塞维慈也说过：‘没有一成不变的战法’……自然国父对于战术的认识，不是永久不变的论者，且以受到拿翁、克氏理论的影响。”它经历了“点的战术”、“线的战术”、“平面战术”、“立体战术”的演变过程。

李浴日还认为，孙中山重视战争战术的实践。“国父认为我国在现代战争中，应先讲战术。他说：‘自海禁既开之后，与英战，与法战，与日战，与联军战，未有不败者，非无枪炮，不谙战术故也。苟谙战术，则昔日安南之黑旗，法国患之，南非洲杜国之农民，英国患之。’但他却反对囫圇吞枣、依样画葫芦地抄袭外国的战术。”<sup>(46)</sup>李浴日把它分为攻势和守势。不过，“国父的战术是以采取攻击为主的，并且我们根据他如下的电令亦可以看出来。”

1、攻势战术。(1)“以动制动”战术。即为歼灭、战胜敌人，对敌实行前攻、后攻、左攻、右攻、或袭击、扰击、诱击、伏击、截击、侧击、尾击、追击等各种打击。其一、电令许某：“陈天太部已出四会矣。现战情已变，江门军当全数出三水芦苞，向高塘新街方面进攻，以速扫灭击省城之敌（指陈炯明逆军——浴日）”其二、电令胡汉民传令永丰舰长：“现杨总司令希闵亲率滇军由龙岗出击淡水平山之敌，该舰长搜击海上偷渡之敌，毋使漏网。并相机与杨总司令联络，协同动作。若无线电不通，着盐运使派安北舰传令，并助永丰击敌。”其三、电令虎门廖湘芸司令：“我追击军大破残敌于石滩之东，现已占据福田石龙之线，残敌向惠州溃退，虎门各部，着速出击，以扫荡石龙南东之残敌为要。”<sup>(47)</sup>(2)“奇袭”战术。这是古代孙子主张的“以正合，以奇胜”的战术。即以“神速”和“秘密”袭击敌方。李浴日认为，国父在战术上最喜用“奇兵”（有时亦包括战略）：在《致石青阳与黄复生从速图陕电》曾说：“用兵忌攻坚，尤贵出奇。”1923年东江之役，致电朱培德、许某等：“望显丞抽一劲旅抄敌人后路为

要。”致电刘某：“望兄急调一队至白沙堆，一以绝敌人路，二可保我航线，闻敌人食粮辎重，皆在风门坳附近，若兄能照此行事可悉夺之，则博围可解，我军实亦加利莫大也。幸速图之！”

<sup>(48)</sup> (3) “游勇”战术：“即现今所谓游击战术。国父于进行推翻满清时，即用此种战术。”此种战术曾为安南的黑旗军用以抗法及南非杜国的农民（波耳人）用以抗英，李浴日认为孙中山对此种战术素有研究，觉得很有实用性，曾谓“此种战术颇适用于中国，若以北方交战，尤为相宜。跟着举出此种战术的五种技能：一曰命中，二曰隐伏，三曰耐劳，四曰走路、五曰吃粗。”<sup>(49)</sup> 孙中山在南方领导武装起义和北伐战争中广泛运用此种战术。(4) “以寡击众”的非常战术。亦称革命战术，或精兵战术。孙中山解释道：“用我军一千人，可以打破敌人一万人，用我军的一万人，可以去打破敌军十万人。”甚至“用一个人打百个人，用一百个人打一万人。”其中钦廉起义是其中典范：“自安南入钦廉起义，当时到钦廉来抵抗革命党的清兵，有两万多人，黄克强带的‘革命军’不过两百人，所有的武器不过两百枝枪……照这一次战争说：革命军就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人，像这样的战斗，是非常的战斗，不可以常理论。”<sup>(50)</sup> 又如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武昌起义等，都是“以寡击众”的非常战术。

以上从李浴日的归纳可以看出，孙中山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它的战略、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国父的战略、战术是最适用于中国革命战争。”他在不同的时期所采取的不同战略、战术对以后的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些直接应用于抗日战争，如持久战、游击战等，这是孙中山留给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他的“战争战术思想与其它方面的思想比起来，也显得比较薄弱，甚至还有片面的地方。比如孙中山虽然指明敌人是腐朽的，要敢于和敌人斗争……但他却未能认识到在和敌人进行具体斗争中，要重视敌人，集中兵力，有效地打击敌人。”<sup>(51)</sup>

## 六、关于“知难行易”的军事哲学

### (一) “知难行易”的由来

知行观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哲学史观。它源于《尚书·说命中》：“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孔传：“言知之易，行之难。”后被概括为“知易行难”。这里的“知”指知识、认识或道德观念；“行”指行为、行动、实践。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认识到中国近代革命事业不成功，是因为受到这个传统认识论束缚。他以近代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和科学技术为背景，提出了“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他认为，“行”与“知”的关系是“行先知后、由行致知”。“它的特色在于把行——实践提高到首要地位和强调真知——理性认识获得的困难和

必要。”<sup>(52)</sup> 强调“实践在先，认识在后，由实践产生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的辩证关系；它重视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具有唯物主义思想。

李浴日认为，这个哲学思想应用在“孙文兵学”中，同样是正确的：如“发明射击原理较实行射击难，策定作战计划较执行作战计划难，设计架桥难于执行架桥，设计要塞难于构筑要塞……推而至于发明飞机、大炮、坦克、雷达、飞弹及原子弹等亦比制造和使用为难之又难。”

<sup>(53)</sup> 他解释道：“国父所谓的‘知’，决不是泛泛的知，空谈的知，是真知，即科学的知。”从时间上划分，经过三个时期：“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即由古代的“不知而行”时期，进化到中古的“行而后知”时期，再进化到近代科学发明之后的“知而后行”时期。这个划分表明，“前者是被反映者，后者是反映者。”符合唯物史观。然而，他又认为：对军人来说，“亦可把最高统帅、普通军官及士兵各阶级（层）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及不知不觉者。”这种把军人当做三等的划分，就带有唯心主义色彩。

## （二）“知难行易”的军事哲学内容

1、“能知必能行”。它强调的是“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孙中山在《〈国民要以人格救国〉讲词》里说：“科学的知识，不服从迷信，对于一件事，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研究屡次不错，始认定为知识。”李浴日阐释道：“我们军人的智识学问，不是徒在书本上死读死记及在课堂专心听讲，所可切于实用，须从实地观察，实地演习，或在实战中去理解它，去把握它，然后才不会重蹈赵括徒读父书的覆辙。”这样自然可以达到“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的境界。<sup>(54)</sup> 这一阐释表明，军事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军事实践第一，认识第二，认识必须上升到实践上去，用实践来检验。

2、“不知亦能行”。包含二层意思：一是“行先知后”。孙中山认为，人们在知（认识事物）之前，可能已经在行（实践）。二是“行以致知”。这个“知”，李浴日解释为包含知不完全的意思。人们在行（实践）的过程中，可以获取外界的知识（知），行（实践）是由不知而致其知的途径和手段。“比如对敌人情况不明的时候，如下最大决心，实行冒险攻击，亦可以压制敌人，并可以从攻击等行动中去获得更真确的情报，以为我进一步行动的根据。假设我们因对敌情不大明了，必待取得更完备的情报然后动作，固会错过‘战胜之本’的宝贵时间，反会给敌人以获得关于我更真确的情报的机会，又会丧失敏捷攻击及初步获胜的利益。”<sup>(55)</sup> 它表明军事实践在先，认识在后，军事实践不仅是广泛存在的客观事实，而且是认识、进化的必要门径。

3、“有志竟成”。李浴日认为，军事上要完成任务，建功立业，必须立下坚贞不拔的意志，发挥整个精神力量来实践力行。否则敷衍塞责，畏难怕死，决无成功之理。“夫事有顺乎天

理，应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这就是说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不能停滞，必须冲破禁锢，深化认识，勇于实践，才能取得革命事业的成功。

“知难行易”的军事哲学的阐述，是分析孙中山军事哲学的精华所在，体现了李浴日对孙中山军事哲学的深刻理解，反映了孙中山“知行观”在暴力革命中的指导作用。

## 七、关于“反共、抗俄、复国”的战争思想

“反共、抗俄、复国”是国民党政府撤退至台湾后于1949年—1980年在台、澎、金、马地区推行的政治策略及宣传攻势。“共”指中国共产党，“俄”则指前苏联，“国”是中华民国。该政策指称前苏联为“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为“共匪”，对台湾民众加以宣传，借此稳定人心，希望有朝一日反攻大陆，歼灭共产党，恢复对大陆的统治。为配合这一宣传，李浴日到台湾后增订出版《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并以此为例证，对孙中山军事思想进行阐释。与1942年出版的《中山战争论》比较，可以看出《中山战争论》是以抗日战争为例证，为抗战服务，反映了李浴日的爱国、抗日思想。而《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以“反共、抗俄、复国”为例证，所作的阐释是为蒋介石政治集团服务，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前，国共两党的关系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孙中山一生奋斗的目标和遗愿，是海峡两岸每个人应肩负的历史重任。今天，我们要运用他的战理来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建设强大的国防。

## 八、李浴日的孙中山军事理论研究的价值和贡献

孙中山研究属于领袖人物研究。民国时期和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大多倾向于介绍他的生平事迹、出版其著作方面，对他的思想研究，也局限于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军事思想研究几近空白。李浴日对孙中山怀有崇敬之情，他基于《孙子兵法》的研究及创办《世界兵学》的机会，促成了他对孙中山军事理论的研究。然而，“国父战争理论……博大精深，阐扬匪易，尤其散见于全部遗教之中，未成体系。”<sup>(56)</sup>因此，李浴日克服了种种困难：在韶关的山岳中，他把寒夜冷风横扫松涛当做“古乐般的弹奏”，把四作的野火当做“火龙的飞舞”，又借秋凉万里长征，由韶赴渝，由渝返韶，“博访周咨”，于1942年完成了《中山战争论》。当时，“对国父革命战理作有系统的研究，尚无第二部著作”，“何况又属创举”。所以，该书的出版成为开拓之作，李浴日成为“孙文兵学”研究的奠基者。蒋介石对此十分重视，亲自召见并当面嘉勉他（第

一次召见和嘉勉为《抗战必胜计划》出版后)。李浴日站在民主革命的立场,第一次把孙中山的军事理论体系化:他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战争观,军事思想的渊源、内涵及其形成、发展,战略战术、军事哲学等等做了相当系统的整理、概括和阐述,为人们认识这位“被压迫民族中最伟大的革命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历史依据。李浴日这项有益的研究,填补了民国时期“孙文兵学”研究的空白,明确确立“孙文兵学”在近代军事学上的理论地位。为构建孙中山军事科学做了很大的努力和有益的尝试,显示出他高深的军事理论功力。他以孙中山军事理论为代表,用中外古今军事战例加以阐释,与孙子古老的军事理论相衔接,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军事学术向近现代军事学术成功转型。由于“国父的战争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真理,所以阐扬它来建立中国今后的战争理论体系,实为必然的趋势。”由于孙中山“战争思想,洵应特加阐扬,俾能正确指导战争,而永建中国今后之战争体系。”因此,李浴日把此项研究作为构建现代(民国时期)中国军事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意义的是,李浴日“却且于阐扬战争思想,以救国家、民族,贡献至伟也。”<sup>(57)</sup> 1943年他在再版序言里就以此分析抗战已到反攻阶段:“国父当年誓师北伐的剑气,启示我们今日的抗战是要反守为攻了。”他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对日反攻。从中可知,李浴日研究孙中山战争理论,是希望用来指导抗日战争。值得一提的是,李浴日到台湾后在其著作里能用孙中山军事学理客观分析和总结国民党在大陆的军事失败教训,为蒋介石军事集团调整军事政策提供参考,是难能可贵的。如“我们在大陆上的失败,实先败于其所指挥下中共的宣传战。”“此次大陆的失败,由于中共的宣传压倒我们的宣传,今日我们更要加倍反省才好。须知他日反攻大陆,专靠‘军事的奋斗’是不够的……还要注重‘宣传的奋斗’”说明李浴日是一个敢于直言的学者。李浴日对孙中山军事理论的历史贡献嘉惠学林,为两岸学术界所公认,对后来的研究起到了相当大的引导、推动作用和有很大的借鉴意义。1989年,由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军事思想与实践》一书,在大陆被同行认为“填补了国内孙中山军事思想研究的空白”。该书概括全面,对孙中山的军事思想的评价客观、公允,确有特点。虽然写作观点、立场、方法与李浴日有所不同,但两书却有许多共同点。而李浴日于1942年完成的《中山战争论》却比《孙中山军事思想与实践》早了近半个世纪(47年)。正如邹鲁评价那样:“李君浴日夙治兵学,见解独到,近取国父有关兵学遗教,著《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一书,将国父各种战争理论,分别阐述,其研究可谓勤而有获者矣。”<sup>(58)</sup> “李君此书,首言国父战争思想,次言战时政治、经济、宣传诸端,并以精神力为决胜之本,是已深得国父革命战理之真谛。”<sup>(59)</sup> “李浴日先生,对兵学造诣甚深……承其述从事于《中山战争论》之撰著……读之竟,则其精深独到之处,尤深钦仰。”<sup>(60)</sup> 由此可见,李浴日还是一个孙中山军事理论的捍卫者和忠实实践者。当然,

李浴日的孙中山军事理论研究也有不足的地方，如对孙中山晚年军事思想飞跃的研究较少涉及、对孙中山军事理论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未能提及等等。

今年是李浴日诞辰 103 周年，也是辛亥革命胜利 100 周年，人们重温李浴日的孙中山军事理论研究，显得十分有意义。我们相信，随着孙中山军事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李浴日这一开创性的研究及其成果，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将给人们更多的启示。

**謹以此文紀念李浴日先生誕辰 103 周年暨紀念辛亥革命勝利 100 周年！**

### 注释：

(1) (2) (3) (4) (7) (8) (10) (11) (16) (17) (19) (21) ( ) 26) (30) (31) (32)  
(34) (40) (47) (48) (49) (50) (53) (54) (55)

李浴日《中山战争论》（1943年12月世界兵学社再版本）第196页，第1页，第4页，第2页，第3页，第184页，第3页，第5页，第25页，第25页，第27页，第27页，第35页，第103页，第105页，第111页，第123页，第159页，第169页，第170页，第171页，第175页，第192页，第194页，第195页。

(5) (6) (9) (12) (13) (18) (22) (23) (24) (25) (27) (29) (35) (36) (37) (38)  
(39) (41) (42) (43) (44) (45) (46) (56)

李浴日《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1952年7月台湾世界兵学社出版）第2页，第2页，第3页，第6页，第13页，第29页，第21页，第22页，第20页，第29页，第26页，第48页，第75页，第76页，第79页，85页，第94页，第101页，第102页，第102页，第102页，第104页，第107页，自序。

(14) 黄季陆编《.总理全集》（1944年成都近芬书屋，下册）180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20)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21页

(27) 《孙中山选集》第825页

(33) 《孙中山全集·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第5卷 第135页

(51) 《孙中山军事思想和实践》（1989年4月军事科学出版社）第251页

(52) 张磊《孙中山论》（1986年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第339页，

(57) (60) 陈南平《〈中山战争论〉再版序》，载1943年11月世界兵学社《兵学论丛》；

(58) (59) 邹鲁《〈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序》。

### 参考文献：

- 1、《孙中山全集》；
- 2、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1938年2月商务印书馆；
- 3、李浴日《中山战争论》1942年7月世界兵学社；
- 4、李浴日《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1952年世界兵学社；
- 5、张磊《孙中山论》，1986年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
- 6、《孙中山军事思想和实践》1989年4月军事科学出版社；
- 7、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1991年8月中华书局；
- 8、《李浴日纪念基金会论坛》文献资料。

2011年6月定稿

### 作者介绍

李龙，1966年10月出生于雷州半岛一个普通农家。大学本科毕业。长期以来，致力于区域文化的研究、创作和收藏，为雷州文化研究的民间主要学者之一。现为湛江师范学院雷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湛江海洋大学雷州文化基地研究员，雷州市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电子邮箱：[leizhoulilong@163.com](mailto:leizhoulilong@163.com)